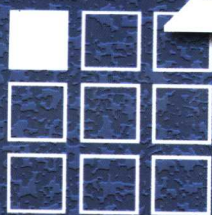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哲学

20世纪



西方哲学在中国

20SHIJI XIFANG ZHIXUE ZAI ZHONGGUO

郭庆堂 孟 伟 丁祖豪 编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0110110

B221
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20 世纪中国哲学

20 世纪西方哲学在中国

郭庆堂 孟 伟 丁祖豪 编著



201101100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西方哲学在中国/郭庆堂,孟伟,丁祖豪编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2.1

(20 世纪中国哲学)

ISBN 7-81070-466-4

I. 2... II. ①郭... ②孟... ③丁... III. 哲学,西方国家—传播—中国—研究—现代 N.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3475 号

书 名 20 世纪西方哲学在中国

编 著 者 郭庆堂 孟 伟 丁祖豪

责任编辑 张怡菲 孙 浩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内 邮政编码 221008)

排 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中国矿业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76 千字

版次印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50 册

总 定 价 100.00 元(四册)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需要西方哲学催化	4
二、中国人现代化需要西方哲学启蒙	10
三、中国社会现代化需要西方哲学引导	12
四、“以夷为师”启动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17
 第一章 变革社会、启蒙国民——20 世纪初传播西方哲学 的主题	1
第一节 西方哲学初入中国	1
一、清末中西文化交流中触及西方哲学	2
二、日本是西方哲学初入中国的重要桥梁	4
三、20 世纪初全面启动对西方哲学的输入	7
第二节 变革社会的理论武器	9
一、严复译介西方进化论哲学	9
二、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输入	12
第三节 科学与人本精神的早期启蒙	14
一、严复介绍西方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	15
二、王国维引入西方意志主义人本哲学	17
第四节 会通中西的初次尝试	21
一、“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新文化的建构	22
二、尝试中西会通的文化意义	25
第五节 改造国民性的探索	27
一、“新民”理想的提出	28
二、无情批判国民劣根性	29
三、重铸新型的国民性	31

第二章 批判传统、革新文化——新文化运动引发西方哲学

广泛传播	34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34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35
二、大力提倡科学与民主精神	38
三、重估一切传统价值	43
四、“新民”理想的延续	50
第二节 全面输入西方哲学	52
一、新文化运动引导西方哲学传播	53
二、全面与忠实地翻译西方哲学	56
三、邀请著名西方哲学家来华讲学	59
第三节 翻译与研究西方哲学的初步探索	65
一、科学主义哲学的翻译与研究	65
二、人本主义哲学的翻译与研究	69
三、西方古典哲学的翻译与研究	75
第四节 科学主义的兴盛——胡适倡导实验主义	78
一、从追求科学到科学崇拜	78
二、大力宣介实验主义哲学	81
三、着力提倡实验主义方法论	83
四、认同实验主义实在论与真理论	86
五、应用实验主义方法论	88
第五节 保守主义的回应——梁漱溟倾心生命哲学	90
一、质疑极端科学主义文化观	91
二、建构调和中西的文化哲学	94
三、吸收西方哲学的文化特征	97
第六节 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	99
一、截然对立的東西文化	99
二、东方文化派的挑战	101

三、科玄论战的世界文化背景	103
四、科学派与玄学派的理论分野	104
五、科玄论战的实质与意义	107

第三章 深入研究、会通中西——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

哲学体系的形成	110
第一节 原原本本输入西方哲学	110
一、反思新文化运动对西方哲学的传播	111
二、学者们高质量地翻译西方哲学原著	112
三、西方哲学介绍文章与专著的大量涌现	122
第二节 深入研究西方哲学	126
一、西方哲学史的深入研究	127
二、陈康与古希腊哲学研究	128
三、郑昕与康德哲学研究	130
四、贺麟与黑格尔哲学研究	132
五、洪谦与维也纳学派哲学研究	137
第三节 全盘西化与中国文化本位观的论争	138
一、30 年代重开中西文化论争	138
二、全盘西化派与本位派的理论分歧	142
三、论争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146
第四节 创建会通中西的现代哲学	148
一、新唯识论与生命哲学	148
二、新理学与新实在论	156
三、金岳霖吸纳实证主义	164
四、新心学与新黑格尔主义	169

第四章 大陆批判拒斥、台港会通中西——建国后 30 年西方

哲学在中国的不同命运	177
第一节 建国初以苏联模式对待西方哲学	178

一、“一边倒”形势下传播西方哲学	178
二、主流哲学支配下译介西方哲学	181
三、学术政治化主导下批判西方哲学	183
第二节 西方哲学传播的短暂繁荣	188
一、努力冲破苏联模式和“左”倾抬头	188
二、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西方哲学	191
三、短暂的宽松环境下取得的研究成果	197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扭曲西方哲学	201
一、文化专政的对象与政治斗争的工具	201
二、困境中谋求发展的艰苦努力	205
第四节 牟宗三与康德哲学	207
一、新儒家在台港的崛起	208
二、传统文化开出现代价值	210
三、借助康德道德哲学梳理宋明儒学	213
四、重建道德形而上学超越康德哲学	217
 第五章 传播恢复繁荣、研究走向正常——改革开放以来	
西方哲学传播的新景象	221
第一节 西方哲学传播的拨乱反正	221
一、重新确立党的正确思想路线	221
二、努力恢复西方哲学的正常学术研究	224
第二节 西方哲学翻译的繁荣局面	226
一、翻译丛书的大量涌现	227
二、西方哲学史的翻译	228
三、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翻译	229
四、西方近代哲学的翻译	229
五、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翻译	231
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译	233
七、开拓现代西方哲学翻译的新领域	234

第三节 学术性研究的回归·····	237
一、重新理解与评价西方哲学·····	237
二、加大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力度·····	240
三、弥补西方哲学薄弱环节的研究·····	241
四、加强研究西方哲学的理论深度·····	245
五、重视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	247
六、挖掘西方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253
七、尝试比较哲学的学术研究·····	256
第四节 主体意识的觉醒——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热·····	259
一、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热·····	260
二、尼采的意志主义哲学热·····	264
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热·····	268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热·····	271
第五节 新儒家全方位吸纳西方哲学·····	276
一、刘述先的境界形而上学·····	276
二、成中英创立本体诠释学·····	283
结 语·····	290
参考文献·····	292
后 记·····	294

第一章 变革社会、启蒙国民

——20 世纪初传播西方哲学的主题

1898 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了维新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1911 年,又爆发了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伴随着这两次社会变革,西方哲学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传播力度虽然不大,但是,却迎合了社会变革的需要,特别是起到了启蒙国民的作用。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讲,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曾经回忆过梁启超在这一时期传播西方文化的工作对他产生的影响,他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有更高的民族,很高的文化。”^①可见,在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传播不仅促进了中国的社会制度变革,而且通过思想启蒙,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第一节 西方哲学初入中国

1898 年,维新变法失败后,许多维新志士流亡海外,他们中很多人转向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引进。不仅改良派意识到传播西方文化的重要性,逐步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主角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非常重视西方文化的传播。但是,从总体上说,西方文化以及哲学的传播还是服务于政治变革的需要,也就是说,政治变革仍然是社会变革的主题,思想变革还是次要的问题。这种情况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

① 胡适:《四十自述》,第 170 页。

期才得以改变,思想文化变革才成为社会变革的主题。历史也最终证明,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思想而得到传播并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历史面貌。

一、清末中西文化交流中触及西方哲学

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之间除了物质层面的交锋之外,在文化方面也展开了交流,这为20世纪初大规模传播西学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留学西方,学习并且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另一方面,西方的知识分子来到中国,主动地送来了西方文化。

在清朝末年,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是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是容闳等人,容闳从美国回国后,就一直大力提倡并鼓励向海外派遣留学生,鼓励向西方亲身实地的去学习,从而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1877年3月31日,出于洋务运动的需要,在洋务派的大力支持下,中国近代第一批有组织派遣的留学生开赴西欧各国。此后,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第二、三、四批留学生分别被派出。这些留学生主要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科技文明被派去的,而且其中大部分的留学生后来都成为我国科技、工业领域中的开拓者。不容忽视的是,很多人在带回西方先进科技文明的同时,也接受并且带回了西方的政治法律和哲学的新思想观念。例如,严复本来是被派去英国学习造船的,但是他却翻译了《天演论》,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戊戌变法之后,留学活动继续开展,主要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以学习军事和实业为主,以公费为主。除了向欧洲派遣留学生之外,日本也是留学的主要国家,1896年,中国派出首批赴日留学生,1902年,赴日的留学生达到500多人,其中民间自费的非常多,到了1906年,居然达到8000多人。除此之外,由庚子赔款兴起的留美教育也是20世纪初留学活动的主流。所有这些留学活动,大大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学到了先进的西方物质文明,而且带回了西方的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和西方的生活方式等。他们懂得西方国家的语言,对西方哲学在

中国的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许多人在 20 世纪初,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成为传播西方哲学思想的主力军。

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是国门被打开的一个必然结果。国门被打开后,一方面,中国人通过留学西方带回了先进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人进入中国,主动地介绍西方文化,从而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清朝末年,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些西方哲学的传播工作。留学西方的中国人——王韬就写过《英人培根》;颜永京翻译过斯宾塞的《肄业要览》和海文的《心灵学》,此外,中国人在这一时期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是非常少的。相反,对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来中国的西方人做的工作就更多一些,并且涉及的内容也更宽泛一些。这些西方人主要是一些传教士,他们不仅介绍西方现代的哲学思想,还介绍一些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哲学思想。在这些著作中有:

慕维廉的《培根格致新法》,被连载于 1877 年的《格致汇编》上,里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培根的著作《新工具》第一卷的内容。

韦廉臣的《希利尼原流备考》,被连载于 1877 年诸期的《万国公报》上,其中简略地介绍了从泰利士到斯多葛学派的古希腊哲学思想。

1885 年,在艾约瑟著的《西学略述》第五卷“理学”(也就是哲学)中,简略地介绍了希腊哲学,包括伊奥尼亚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漠克利特、伊壁鸠鲁、斯多葛学派的思想,此外,还介绍了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包括托马斯·阿奎那、邓·司各脱的思想,还有西方近代的哲学,有笛卡尔、马尔布朗士、洛克、巴克莱、休谟、莱布尼茨、康德、苏格兰学派的思想,同时也介绍了当代的孔德和斯宾塞的哲学。

1885 年,艾约瑟翻译了耶芳斯的《辩学启蒙》,原书系耶芳斯为《科学入门丛书》写的一本小册子《逻辑》,后来严复于 1909 年也翻译了这本书,名字叫做《名学浅说》。

另外,还有傅兰雅著的《理学须知》,这本书是对穆勒《逻辑体系》

一书的简要叙述,虽然出版于1898年,但是比起严复1905年翻译出版的《穆勒名学》,也就是穆勒《逻辑体系》前半部分,要早七十八年,而且傅兰雅介绍了《逻辑体系》全书的内容。

实际上,西方哲学的广泛传播是20世纪的事情,但是,不能忽视19世纪末期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一定的意义上,19世纪末期的中西文化互动是20世纪西方哲学大规模东渐的基础。

二、日本是西方哲学初入中国的重要桥梁

在西方哲学向中国早期输入的过程中,从西方先进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引进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此外,日本在向中国传播西方哲学的过程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认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前眼中的弱国变成了强国,一时间,人们意识到日本不仅在政治制度革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更为根本的是日本在输入西学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因此,仿效和学习日本吸收西学的经验,就成为当时爱国人士的文化共识。当时,不仅大量的青年学生东渡留学,而且不少维新派和革命派为了逃避国内封建势力的迫害也前往日本,从而得以研究和学习日本成功借鉴西学的经验。同时,从政治上讲,当时的日本政府对待中国人较为宽容,特别是对民间友好人士更是热情的欢迎,所有这些都吸引中国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云集日本。这样,日本就成为中国留学生和进步人士最为集中的地方。在这里,许多中国人主动地接触和学习西方哲学,从而使日本成为西方哲学在近代输入中国的重要桥梁。

从历史上看,日本也是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也是被动地解除了长期延续的锁国政策的,然而,明治维新时,日本人除了主动地学习西方科技与政治文明外,还主动地吸收西方哲学。当时,日本天皇向国民宣示了五条御誓文,其中就讲到要“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正是这种向西方全面学习的开放态度与做法使日本逐渐强大起来。与近邻中国相比,这一基本的文化开放格局决定了日本在输入西方哲学方面领先了一步。

在日本,早在 1862 年的时候,被称为“日本西洋哲学之父”的西周就提出了讲习希腊和欧洲哲学的草案。1877 年,东京大学首先在大学中正式讲授西方哲学,并且直接聘请外籍哲学教授讲授西方哲学。1884 年,加藤弘之、西周等人积极组织“哲学界”,为日本后来哲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知识精英。同时,日本对西方哲学的翻译传播也在一直进行,如卢梭的《民约论》,最早于 1878 年即有服部德的译本,1882 年又有中江兆民的《民约译解》出版。1873 年,密尔的《伦理学》已经在东京被作为学校教材来使用。1877 年《自由之理》的日译本出版。1878 年,斯宾塞的《代议政体论》被翻译成日文。1880 年,斯宾塞的《教育学》被译成日文。1876 年,何礼之翻译了边沁的《财论纲》。另外,边沁的《科学正宗》、《自由论》均于 1883 年翻译成日文出版问世。同时,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德国哲学占据了日本的哲学界,先是黑格尔哲学流行,继而康德、尼采哲学也流行起来。到了 19、20 世纪之交,哲学界的前卫已经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

而在中国,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末,一般知识分子仍然抱守“中体西用”的信条,排斥西方文化。虽然 1863 年在北京就已经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也相继设立了同类的译书机构,但是所翻译的著作影响非常有限,而且内容上多局限于西方的历史、地理、科技等自然科学著作。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哲学的传播非常有限,当时对中国近代思想产生最大影响的两本书:一是《天演论》,一是《民约论》,前者于 1895 年才开始翻译,后者于 1901 年才开始翻译。

到 20 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而日本在中国的这一变化过程中则是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901 年,中国留日学生开始翻译哲学社会科学类的书籍,留日的杨廷栋等励志会会员还创办了杂志《译书汇编》,仿照日本杂志的体例,刊载大量留学生的翻译著作,这是最先出现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刊物。之后,流亡日本的各党派人士办的杂志,如《民报》、《船报》也相继问世,为哲学的翻译与介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园地。留学生,包括流亡与旅居日本的许多著名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

秀、李大钊、李达、艾思奇、鲁迅、郭沫若也开始了解和传播西方哲学。

在当时居住日本的思想家中,梁启超对西方哲学传播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认为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主要贡献就是在日本发表了许多西方哲学思想的文章,可称为一代启蒙大师。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面对日本的数千种西学著作,他从中汲取了巨大的思想活力,并且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哲学的论文,内容极为广泛,从培根、洛克到康德、斯宾诺莎等都有所涉及。但是,梁启超对西方哲学的介绍是相当浅近的,他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解也是不确切的。王国维没有去日本,但是,最初王国维也是借助西方哲学的日译本而对西方哲学进行研究的。早年,王国维进入上海的东方学社学习日语,花了两年时间学会了日文。此后,他就通过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的《西方哲学史》日译本来研究康德的哲学。通过日本接触西方哲学的还有中国近代哲学家章太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章太炎旅居日本,接触和研究了大量西方哲学书籍。特别是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第三次到日本,他精心研究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学说,以及康德、叔本华、尼采德国哲学家的学说,这对章太炎日后的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初,通过日本,中国人不仅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而且,在后来中国人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中,许多哲学的译名也是来自于日本。许多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日本翻译西方哲学的影响,借取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名称。例如,“哲学”这个基本的概念,也就是西文“philosophy”,就采用了日本哲学家西周所确立的日文译名。在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上,中国学者沿用的日文译名还有感性、悟性、归纳、演绎等一大批词汇。

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与地缘条件下,日本在西方哲学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这一角色确实帮助中国人更快地接纳了西方哲学。由于是间接地接纳西方哲学,因此,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也就多了一层隔膜。后来,许多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都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们通过直接学习、创造性地翻译等途径来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从而开始了直接接纳西方哲学的历史,日本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桥梁作用。

三、20 世纪初全面启动对西方哲学的输入

19 世纪末,西方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但是,这时只是零星地输入。全面意义上启动西方哲学的输入,则是发生在 20 世纪最初的几年。这种态势,可以从当时翻译出版的西方哲学的书籍和中国学者发表的西方哲学文章的情况得到证实。在翻译西学著作方面,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提供了两个翻译西学著作情况的书目表,一个是 1899 年的《东西学书录》,一个是 1904 年的《译书经眼录》。^①从这两个书目表上,我们可以比较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西方哲学著作翻译和出版的情况。可以看到,19 世纪末,西方哲学著作开始翻译出版,到了 20 世纪初的几年,翻译出版的西方哲学著作有了显著的增加。

在 1899 年的《东西学书录》中,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书籍数量共有 228 部,占翻译著作总数的 41%,而工艺和兵制两类著作也占了总数的 19.3%,这说明在 19 世纪末输入的西学著作中,兵制、工艺等实用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著作是西学输入中国的主流。但是,在《东西学书录》的学科分类中,却第一次出现了哲学类,当时叫理学,其中收录了 12 部书。从内容上看,大部分是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方面的书籍,如《辨伪启蒙》、《理学须知》、《格致新知》等,其余的都与哲学没有关系;在其他的分类中,却收入了《天演论》等书。由此可见,19 世纪末,在西方哲学传播的开端,不仅西方哲学著作的数量很少,而且著作目录的分类也模糊不清,这是西方哲学开始输入中国的一个必然景象。

在 20 世纪初的几年,西方哲学著作的传播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 1904 年的《译书经眼录》中,兵制、工艺等实用科学的著作下降,仅占 6.3%;自然科学各门类著作的翻译数量也开始下降,占

^① 黄见德等:《西方哲学东渐史》,武汉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53 页。

23%；而哲学、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类书籍的翻译数量大幅度上升，成为西学输入中国的主流。其中，政治方面收录了70部，占总数的13.1%，哲学类译书的增加则是十分明显的，共收录了34部，占总数的6.4%；哲学社会科学各类译书加在一起，占到总数的61.5%。

从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西方哲学的文章看，20世纪初也是大量传播西方哲学思想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开始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一书，其中辑录了从1857年到1918年60年间的近代期刊，共计495种，一万一千余册的全部篇目。在这些篇目中，从1895年到1900年发表的文章中专题介绍西方哲学的论文，只有1899年刊登在《新亚时报》第十册上的《培根论》一篇，数量极少。绝大多数有关西方哲学的文章，都是发表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其中，80%的文章又都集中于1903年、1904年和1905年这三年中。

20世纪的最初几年，西方哲学的输入全面开始。西方哲学的输入数量剧增，但是，对西方哲学的输入却缺少选择性以及针对性，同时，传播的质量也不高，缺乏学术深度。

从输入西方哲学的内容看，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如古代希腊罗马哲学，还有当时诞生不久的现代西方哲学，都被介绍到中国。从《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中所列的中国学者发表论文的目录中可以看到，其中有：①西方哲学通论，19篇。②古代西方哲学，21篇。③近代西方哲学，64篇。④现代西方哲学，43篇。四类共计147篇。^①这些文章涉及的内容有进化论思想，还有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思想，同时也有形而上学和科学认识论等思想。可见，这一时期对西方哲学的传播是非常繁杂的。

另外，在这一时期对西方哲学的传播中，翻译和介绍性的文章占了绝大部分，而深刻论述与评价的研究论著却是十分的稀少。而且，即使是这些介绍性的文章，大多数也是根据国外的哲学书籍转述的。所以，从整体上看，虽然对西方哲学的传播涉及的范围很广，却也明

① 黄见德等：《西方哲学东渐史》，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55～63页。

显呈现出肤浅介绍的特点,当然也就谈不上对西方哲学的消化与吸收了。

第二节 变革社会的理论武器

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西方哲学的传播紧紧地服务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就传播主体来看,宣传西方哲学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主观上,传播西方哲学就是为他们的社会变革活动提供新鲜有力的理论基础;客观上,他们宣传西方哲学确实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仅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角,而且是西方哲学的热情传播者,他们都把传播与接受西方哲学看做是他们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就传播的内容来看,进化论与社会政治思想就是变革社会的理论武器。这说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实用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一、严复译介西方进化论哲学

传播西方进化论思想迎合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它直接地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政治斗争。

进化论是19世纪西方生物学界的一种关于生物界物种发生与发展的革命理论,也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以实地考察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论证了世界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生物到人的自然演进过程。把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一样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发展规律。这种社会进化论的思想最切实地满足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需要,以及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改革传统社会、谋求民族自强的意愿。

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大都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康有为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前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他认为从自然